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02—0001—03

金初女真贵族的倾轧与“伪齐”政权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随着女真人在中原的统治渐趋稳定,曾经戮力征讨辽宋的女真贵族权力倾轧越演越烈,先有东、西朝廷,续有争立傀儡政权,刘豫“伪齐”政权在女真贵族的倾轧中沉浮。

[关键词]女真贵族;宗翰;伪齐政权;高庆裔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2.001

随着女真人在中原的统治渐趋稳定,曾经戮力征讨辽宋的女真贵族开始争夺地盘,树立党羽,东、西朝廷就是女真贵族争权的体现。争权的延续又影响到刘豫“伪齐”政权的建立与废黜。

一、东、西朝廷争权

宗翰权力的扩张首先招致太宗皇权的抵制,太宗即位初年奉行太祖诏命,“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1]宗翰以太祖诏命“一依本朝旧制”为保护伞,一面巩固已有的权力,一面伺机扩张权力。面对宗翰扩张权力的情势,太宗开始有意遏制。天会元年(1123)十月壬辰,太宗诏谕宗翰:“今寄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1]“迁授必待奏请”是太宗试探性扼制宗翰,这一企图很快被宗翰抵制。次年,宗翰入京师朝太祖陵,借机“奏曰:‘先皇帝时,山西、南京诸部汉官,军帅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旧制,惟山西优以朝命。’诏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2]太宗无法直接扼制宗翰,转而扶植宗望制衡宗翰的权力,制衡的

结果使贵族政治二元化,即“东朝廷”与“西朝廷”并立。《大金国志》载:天会三年(1125),“斡离不(宗望)、粘罕(宗翰)分道入侵南宋。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3]

东、西朝廷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区域性军政活动的需要,但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军政活动的需要并不是第一位的,天会五年(1127),宗望薨。六年,刘彦宗薨。在宗辅接宗望任右副元帅的情况下,宗翰并燕京枢密院于西京,其专权意向暴露无遗。这说明“东朝廷”的存在影响了宗翰的专权,他不愿意让“东朝廷”继续存在,也说明了东、西朝廷并存是有矛盾的,太宗扶植“东朝廷”扼制“西朝廷”,制衡两者的力量,以达到维护太宗皇权的目的。

二、宗翰擅权,刘豫得立

宗翰对“东朝廷”的态度,也是他对所有可能与其分权者的态度。继宗望分权之后,挾懒(又名完颜昌,穆宗盈哥之子,盈哥阿骨打父从兄弟)的势力在山东有崛起的势头。挾懒参与伐辽,多有战功。宗翰、宗辅侵宋,挾懒主攻山

[收稿日期]2014-11-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0YJA77002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1D064。

[作者简介]李秀莲(1964-),女,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

东。天会六年(1128),挾懶攻济南,刘豫以济南府降,山东地区基本被挾懶控制。七年,金朝任刘豫为京东西路和淮南等路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其子刘麟知济南府。“挾懶以左监军镇抚之,大事专决焉。”^[4]挾懶与刘豫的“主”与“仆”关系已经确立,迨朝廷议立藩辅如张邦昌者,挾懶力举刘豫。挾懶占据山东后,有借立刘豫发展势力的企图,挾懶的企图与宗翰的专权相遇在刘豫的册立问题上。

关于册立刘豫,《金史·刘豫传》载:“挾懶为豫求封”,宗翰、宗辅为册立“帝位”而议:“既策为藩辅,称臣奉表,朝廷报谕诏命,避正位与使人抗礼,余礼并从帝者”。^[4]《三朝北盟会编》一面说“挾懶尝有许豫僭逆之意”,一面认为刘豫得立完全是高庆裔的活动,而且是高庆裔建言宗翰抢居“册立”之功。

张汇《金虏节要》曰:“先是虏中伪留守高庆裔献议于粘罕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汴京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于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后,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帅可首建此议,无以恩归他人。’盖以金人自陷山东,挾懶久居滨淮(淮),刘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挾懶尝有许豫僭逆之意,庆裔乃粘罕腹心也,恐为挾懶所先,遂遽建议,务欲功归粘罕。”^[5]

宋方史料揣测高庆裔在册立刘豫事件中的地位,依宋人的态度,仿佛高庆裔搅动了宗翰与挾懶之间的矛盾。在刘豫“册立”的问题上关涉到高庆裔的评价,也就是说,一个文士在金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是他制造了政治矛盾,还是他陷入了充满矛盾的政治漩涡?

认识高庆裔在刘豫“册立”中的作用,金、宋史料是可以互为补充的。分析宋、金史料的首要问题是认清“册立”的主持者,主持“册立”活动的当是宗翰的元帅府。首先,太宗闻张邦昌死,命左、右副元帅合兵伐宋,并有诏曰:“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1]也就是说,金朝此时伐宋的目的之一就是“援立藩辅”。其次,天会八年(1130)七月,帅府召集一次诸将的集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娄室征战陕西不利,且“倦于兵”。^[1]所以,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1]遣宗辅往陕西

之事在《金史·宗弼传》中载:“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4]可知宗弼参加了这次集会。从宗弼身上可知集会的另一个议题就是“援立藩辅”。《金史·刘豫传》载:“宗弼北还,乃议更立其人。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挾懶为豫求封。”^[4]挾懶举荐的是刘豫,娄室举荐的是折可求。有说宗弼也举荐一人,是为杜充。据载“完颜宗弼遣人说充,许以中原地封之,如张邦昌故事,充遂降。”^[6]在诸将会议上,援立藩辅的候选人有刘豫、杜充、折可求,三人的取舍最后由元帅府定夺,接下来就是《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元帅府派高庆裔操办“册立”的过程。

三、“伪齐”政权存在于女真贵族争权之中

宗翰同意册立刘豫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其中不能没有高庆裔的谋划。宗翰在三个候选人中认可刘豫是有客观原因的,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适时陕西仅部分被金占领,“册立”折可求没有根据地;杜充也是这样,虽为宋副元帅,但没有自己的地盘。相反,刘豫“知东平府,节制河南州郡”。^[7]其子麟知济南府。从主观上讲,在山东、河南建立刘豫政权对宗翰是有利的,一方面,刘豫政权不影响宗翰在西南、西北诸路的扩张与权力;另一方面,宗翰可以通过控制刘豫占据山东,打破挾懶据有山东的计划,扼制挾懶势力的发展。宗翰、挾懶等人知道,册立自己瞩目的人建立傀儡政权,等于延伸了自己的势力,所以,宗翰摒弃了杜充、折可求不利于自己的候选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杜充自南京至云中,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薄其节,不之礼,久而命知相州。”^[8]宋人说宗翰冷遇杜充是“薄其节”,这完全是以宋人之心度宗翰之腹,外加责难杜充不忠的下场。宗翰排斥杜充是针对宗弼,意在扼制宗弼的势力。宗翰元帅府决定册立刘豫,令高庆裔具体运作其事,挾懶的举荐之功被宗翰、高庆裔的册立之功所覆盖,宗翰幕僚高庆裔的具体活动大致如下:

其一,利用刘豫所拥有的地利,大作“人和”的文章。宗翰遣高庆裔自云中由燕山、河间,至旧河以南刘豫节制的景州、德、博、东平等地,制造诸州郡共戴刘豫之愿状。所谓的吏民“共戴”,表面上是寻张邦昌的“故例”,实际上

是完成了挾懒举荐之功到宗翰“册立”之功的转移。这样,尽人皆知是宗翰使刘豫当了“大齐”的皇帝。

其二,高庆裔与刘豫交换“册立”的条件。《三朝北盟会编》载:宗翰见“吏民愿状”后,“复令庆裔驰问刘豫可否?”这一举动实在出乎寻常,前有张邦昌以死抵“僭立”,金人不顾;后有张孝纯被高庆裔“押解”到“大齐”就职。而对刘豫却彬彬有礼,吏民愿状已呈递,再“问刘豫可否?”根据前后事情的比较判断,一是不可能,二是别有用意。用意即是“遣孝纯辅尔”作为“册立”的条件。“遣孝纯辅尔”是宗翰要在刘豫政权内安插自己的势力,在张孝纯后面还有郑亿年、李邕等,张孝纯为尚书右丞相、郑亿年吏部侍郎、李邕知东平府。

其三,高庆裔衔天子之命,“备礼册命”刘豫。刘豫同意“遣孝纯辅尔”的条件,宗翰令完颜希尹驰报太宗,立刘豫为大齐皇帝。高庆裔为西京留守、特进、检校太保、尚书右仆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上柱国。韩昉为金紫崇禄大夫、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护军,“备礼册命”。

刘豫“大齐”与张邦昌“大楚”政权的建立都是金朝统治的需要。金朝在十年内,疆域遽然扩展至黄河以南,没有统治汉地能力的女真人多方假手他人,建立“大楚”“大齐”政权是假手他人统治的一种方式,是解决女真人崇尚武力扩张而又不谙治世矛盾的权宜之策,而且是朝廷上下一致认同的策略。太宗诏谕左、右副元帅:“援立藩辅,以镇南服。”^[1]刘豫得立则是女真贵族争权的结果,挾懒、宗弼、娄室都举荐

可立之人,都希望树立自己的势力。宗翰独揽大权,横刀夺下挾懒举荐刘豫之功,遏制了挾懒势力的发展,避免了第二个“东朝廷”的出现。

刘豫“伪齐”政权是女真人藉此向中原统治方式过渡的工具,所以政权的存废不是它有无“尺寸功”所决定的,也不是宗翰所决定的,政权的傀儡性使之必仰女真权势者的鼻息。在宗翰当权、高庆裔用事的情况下,“豫每岁于二人厚有所献”是正常的,所谓蔑视其他酋长,是贵族间争权夺利的心理反应。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使他们抱怨:“吾等冲冒矢石拓辟土地,皆为庆裔辈所卖矣。”^[9]这种心理驱使挾懒等由举荐刘豫转向倒掉刘豫,并将其统治的领地出卖给南宋。刘豫政权的废黜表面上看是宗翰的失势,刘豫失去靠山所致,实际上是女真贵族之间的争斗使金朝没有精力攻打南宋,作为攻打宋朝先锋的“伪齐”政权失去存在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脱脱,等.金史: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脱脱,等.金史:卷74[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脱脱,等.金史:卷77[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1[Z].光绪四年(1878年)铅印本.
-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Z].北京:中华书局,1956.
- [7]脱脱,等.宋史:卷2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Z].北京:中华书局,1956.
- [9]脱脱,等.宋史:卷182[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Strife of Jurchen Nobles and the “Puppet Qi Government”

LI Xiu-li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As the Jurchen's ru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ecame more stable, the competition and struggles among the Jurchen nobles were more intense. There were several ruling powers up and down, including the East Court, West Court, and later LIU Yu's "puppet Qi"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trife of nobles.

Key words: the Jurchen nobles; Zonghan; the puppet Qi government; Gao Qingyi